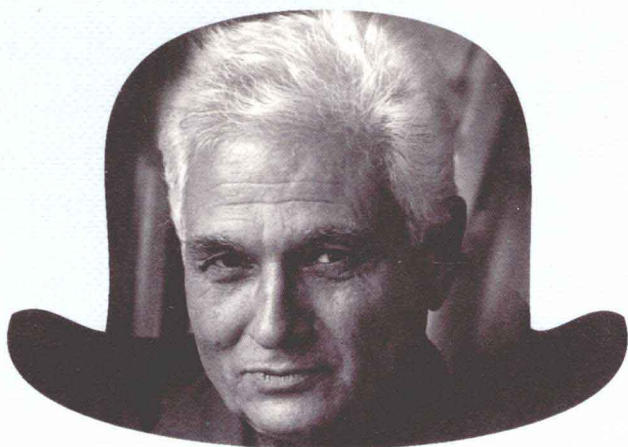




大师传记馆
学术即人生



德里达传

[法] 伯努瓦·皮特斯 (Benoît Peeters) | 著

— 魏柯玲 | 译



Derrida

明道 大师传记馆
学术即人生

德里达传

[法] 伯努瓦·皮特斯 (Benoît Peeters) | 著
魏柯玲 |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德里达传/ (法) 伯努瓦·皮特斯著; 魏柯玲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明德书系·大师传记馆)

ISBN 978-7-300-18193-6

I. ①德… II. ①皮… ②魏… III. ①德里达 (1930—2004) —传记 IV. ①B565.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40280 号

明德书系·大师传记馆

德里达传

[法] 伯努瓦·皮特斯 著

魏柯玲 译

Delida Zhua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70 mm×24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36.75 插页 2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655 000

定 价 8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雅克·德里达的第一部传记被译为中文，这对我来说既是喜悦也是荣耀。

《书写与差异》和《马克思的幽灵》的作者德里达只在2001年来过中国一次，但他很早就开始对中国的语言和文明产生了兴趣。实际上，早在1953年德里达还是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时，他与学习汉语的吕西安·比昂科（Lucien Bianco，中文名毕仰高）就同住一间宿舍。德里达后来以一篇题为《一位中国朋友的朋友》的优美文章向毕仰高致敬，他在其中写到，多亏了毕仰高，他才“学会以不安的、批评的、变动的方式去理解和思考现代中国”^①。整整半个世纪里，关于中国的语言、历史及其天翻地覆的政治变化，毕仰高始终是德里达的主要对话者。尤其因了这位深刻了解中国且具有独立精神的汉学家，哲学家才避免了那一代许多法国知识人对中国的意识形态上的误解和幻想。

毕仰高与中国很早就有真实的接触。1954年夏天，由于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他有幸获得邀请，与包括菲利科斯·加塔里（Félix Guattari）在内的法中友好协会代表团一起在两个半月的时间里走遍了中国。回到法国后，这位《中国革命的起源》（迦里玛出版社，1967年）的未来作者就中国问题滔滔不绝，而德里达就是他独享的对话者。那时的毕仰高与德里达分享同一辆汽车——一辆老掉牙的1932年的C4雪铁龙，还共同订阅《世界报》。他们有着同样的政治信念，属于坚定的左派，但坚决反对斯大林。他们与包括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在内的几名法国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创建了“保卫自由知识分子委员会”，将非共产党员的左翼学生聚集在一起。

随后，德里达和毕仰高两人各自沿着自己的道路前行。在好几年的时间里——我们在本传记的第一部分可以看到——阿尔及利亚问题在政治和个人意义上对德里

^① [法] 雅克·德里达：《一位中国朋友的朋友》（“L'ami d'un ami de la Chine”），载《中国革命的起源：致吕西安·比昂科》（*Aux origines de la Chine contemporaine. En hommage à Lucien Bianco*），巴黎，L'Harmattan，2002，p. VIII - IX。

达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但在哲学上，文字的问题——一直被西方形而上学压抑的文字——在德里达的研究中占据中心地位。在撰写即将令他成名的《论文字学》的过程中，他常常就汉语问题请教毕仰高，很遗憾自己没能认真研读这门语言。

德里达从1964年起执教于高等师范学校。当时，对那里最具政治意识的学生来说，毛泽东领导的中国要比苏联有大得多的吸引力。在德里达发表过一些重要文章的《原样》(Tel Quel)杂志编委会，人们对于“文化大革命”只有相当模糊的概念，却保持着夸张可笑的狂热态度。而德里达对之保有警醒的距离，尽管他不断受到持续的压力。在向毕仰高致敬的文章里，他谈到1968年5月之后的这些年代，那时“最令人不安，有时最危险又最滑稽的教条主义的颀颀主宰着某种巴黎文化的舞台”。

中国问题变成了一个重大的赌注，对于菲利普·索莱尔斯(Philippe Sollers)和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都是如此。1971年，玛丽娅-安东涅塔·马西奥奇(Maria-Antonietta Macciocchi)在著名的瑟耶出版社出版了《论中国》一书，热情洋溢地讲述了在中国三个星期的旅行。此书将掀起激烈的论战。当德里达就此询问毕仰高时，毕仰高并未隐瞒对这本充满谬误与自得的宣传意味浓重的作品持有的恼怒。1972年1月，“马西奥奇事件”将导致德里达与《原样》和索莱尔斯痛苦决裂。

在1972年3月18日致年轻的比利时哲学家埃里克·克莱芒(Eric Clémens)的信中，德里达对这次冲突作出了详尽解释。他一开始就向对方说明他显然对中国没有任何敌意：“在历史—理论层面上，在我们共同的领域里，我不认为自己是最后一个参照中国的人。在最现实的政治层面上，我对中国也没有任何反对之处。”但在德里达的眼里，对这一切还需进行注定艰难的严密的分析。在此之前，他坚持对巴黎知识界以“文化大革命”之名所指称的一切保持“最冷静的批判性的警觉”。未来将很快证明他是对的。而同一个德里达，长期以来被怀疑不关心政治的德里达，有意不合时宜地于1993年发表了杰作《马克思的幽灵》，在柏林墙倒塌和苏联解体之后第一次试图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

德里达的中国之旅从1980年代末起就开始筹划，但直到2001年才成行。当时德里达已有7本书翻译成中文，但大多数译自英文版，造成不少模糊和误解。^① 雅克·德里达希望找到好的对话者，能够在更加严格的基础上推进作品的翻译出版。出发之前，德里达自然还是向老友毕仰高征求建议：中国公众最希望听到什么样的主题？是否可以谈论他最关心的死刑问题？

德里达在中国的第一次讲演于2001年9月4日发表于北京大学，题目是《宽恕、

^① 当时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出版的德里达著作约有《论文字学》、《声音与现象》、《立场》、《他者的单语主义》等几种。——译注

不可宽恕和不受时效约束》。在从北京到南京、上海和香港的旅途中，他还进行了另外两场讲演和几场研讨会，并多次接受访谈。德里达特别对中国学生说，马克思主义并未死亡。哲学家并不就此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确信马克思主义思潮能够重新找回其力量和恰当性，如果它能够摆脱有时以之为借口的极权主义偏差的话。^①

这次旅行本身极为成功。德里达并不掩饰他对中国的强大与现代化，以及随处可见的大规模建筑和工地所感到的惊叹之情。他也十分感动于所受到的礼遇：他到处获得隆重接待，每一步都有人照相。而他最兴奋的是他的许多作品将直接从法文进行翻译。

就在上海，几乎到了旅行的尾声，“9·11”事件发生了。几周之后，他对吉奥瓦纳·博拉多利（Giovanna Borradori）讲述：“那天晚上，我和几个朋友在咖啡馆喝咖啡，老板对我们说一架飞机‘坠毁’在双子塔上。我冲进酒店，从一开始的电视画面就很容易预料到这一切将在全世界的注视下成为一个‘重大事件’。”^②德里达随即在中国香港发表的讲演中对事件进行了初次分析。

对德里达与中国的关系作过这样简短的回顾之后，我想以一个难解而诱人的重要问题作结。雅克·德里达如此深植于法语中的思想如何能够穿越国界呢？这一思想在如此不同的中国传统当中是如何被阅读和看待的？诸如延异^③（différance）、解构（déconstruction）或萦绕学（hantologie）这样的概念所揭示出的语言中的思想经验，还有对安托南·阿尔托（Antonin Artaud）、弗朗西斯·蓬热（Francis Ponge）、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和让·热内（Jean Genet）这些与法语源泉密不可分的作家的精细解读，这一切如何能够在截然不同的另外一种语言的翻译中存续下来呢？

这些问题的答案该由中国读者得出，而答案本身即开启了巨大的研究与思考的空间。无论怎样，我希望这部传记将有助于中国读者进入德里达带来的这份20世纪下半期的重要书写，也让他们发现这个人——脆弱，非凡，令人难忘。

伯努瓦·皮特斯

2013年4月17日于法国巴黎

^① 关于德里达在中国的情况，参见杜小真、张宁编译：《德里达中国讲演录》，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张宁著译：《解构之旅·中国印记：德里达专集》，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译注

^② 雅克·德里达，尤尔根·哈贝马斯：《9·11的“概念”》（*Le “concept” du 11 septembre*），Galilée，2004，p. 164。

^③ 加下划线文字为原书斜体文字。全书同。——译注

哲学家有生活吗？为其作传是可能的吗？这是1996年10月在纽约大学的一次研讨会上提出的问题。雅克·德里达这样开始他的即兴发言：

正如你们所知，传统哲学是排斥传记的，它认为传记是哲学之外的东西。诸位还记得海德格尔关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话吧：“亚里士多德的一生是怎样的？”嘿，答案就在一句话里：“他出生，思想，死亡。”其余的一切纯属轶事。^①

不过这并非德里达本人的立场。早在1976年他就是一次关于尼采的讲演中说道：

我们不再认为一名“哲学家”的传记只是经验性事件的汇集，只在一种体系之外留下一个签名和一个标记，而只有这体系才供人们进行真正哲学的解读，才被认为是哲学意义上的合理存在。^②

那时的德里达呼吁重新探讨“广义的传记，以及狭义的、哲学家的传记”，以再次思考“文集与身体”^③之间的界限。他对此始终关注。在后来的一次访谈中，他仍然坚持说完全不介意谈论“‘传记’的问题”。甚至可以说这个问题令他非常感兴趣：

我是少数几个对此不断提起关注的人之一：我们非常需要（而且需要很好 10

① “Thinking Lives: The Philosophy of Biography and the Biography of Philosophers”, New York, 1996. 关于德里达这次发言的一些片段见 Kirby Dick 和 Amy Ziering Kofman 的影片 *Derrida*（影碟由 Blaq out 出版社于 2007 年发行）。其他片段可在互联网上查到。

② Jacques Derrida, *Otobiographies. L'enseignement de Nietzsche et la politique du nom propre*, Galilée, 1984, p. 39.

③ 法文的“文集”或“汇编”为 corpus，与“身体”一词 (corps) 同源。——译注

地)重新展示哲学家的生活及其以真实身份介入的社会活动,特别是政治活动,无论是海德格尔还是黑格尔,弗洛伊德还是尼采,萨特还是布朗肖,等等。^①

在自己的作品中,德里达在写到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或保罗·德·曼(Paul de Man)等人时亦不惮使用其生平资料。譬如在《丧钟》(*Glas*)里,他大量引用黑格尔的通信,且谈到其家庭关系和财务困境,并不认为这些材料无关紧要或与其哲学工作无关。

在科比·迪克(Kirby Dick)和艾米·齐尔林·考夫曼(Amy Ziering Kofman)拍摄的影片《德里达》的最后几组镜头里,他走得更远。在影片中,当被问到希望在关于康德、黑格尔或海德格尔的记录片中看到什么时,他挑衅地回答:

我想听他们说说他们的性生活。黑格尔或海德格尔的性生活是怎样的?因为这是他们从不谈论的事。我想听他们说说他们从来不说东西。为什么哲学家在其作品中表现得如同无性人?为什么他们将私生活从作品中抹去?为什么他们从不提及私事?我并不是说应该拍一部关于黑格尔或海德格尔的色情片。我是想听他们讲述爱情在其生活中扮演的角色。

更具说明意义的是自传——他人的自传,首先是卢梭和尼采的,但也包括他本人的自传。德里达将自传视为彻底的哲学对象,其原理及细节都值得探究。对他而言,自传甚至是最完美的写作体裁,它最早予以他写作的欲望,并始终令他萦怀。他从少年时代就幻想着写一部生活与思想的庞大日记,一篇从不间断、千变万化因而是绝对的文本:

11 在根本上,回忆录并非人们通常所指的形式,而是一种普遍形式,代表着令我着迷的一切,是疯狂的欲望,想以其独特的语言保留一切、汇聚一切。对我来说,哲学,或至少学术性的哲学,一直服务于回忆的这一自传性蓝图。^②

这并非回忆录的回忆散落在德里达的许多作品中。一部零落的自传的轮廓隐现

^① Jacques Derrida, "Autrui est secret parce qu'il est autre", entretien avec Antoine Spir, repris in *Papier Machine*, Galilée, 2001, p. 378.

^② Jacques Derrida, *Il Gusto del Segreto*, entretien avec Maurizio Ferraris, Laterza, 1997. 我引用的是保存在当代出版资料馆(IMEC)的从未译成法文的手稿。

于《割礼忏悔录》、《明信片》(*La Carte postale*)、《他者的单语主义》(*Le monolinguisme de l'autre*)、《面纱》(*Voiles*)、《盲者的记忆》(*Mémoires d'aveugle*)、《侧道》(*La contre-allée*)，以及其他许多文本中，包括晚期的很多访谈，还有那两部以他为主题的影片，其中充满了具体的有时十分私密的细节，他将之称为“死亡的异质的自传书写作品”(opus autobiathanatohétérographique)。我大量运用了这些极为丰富的材料，同时在可能的情况下均与其他资料来源相印证。

※ ※ ※

本书无意介绍德里达的哲学，更不企图重新解读他的著作，其广阔性与丰富性都将对论者提出持久的挑战。我想尝试的既是个人史，也是思想史。因而我会着重描述德里达的阅读经历和他所接受的影响，他主要作品的源起及其在读者那里引发的震荡，他从事的斗争，还有他设立的机构。但这并不因此而成为一部精神传记。这种说法令我不快，因为它在很多方面似乎排除了许多东西：童年、家庭、爱情、物质生活。对德里达本人——他在同莫里兹奥·菲拉里斯(Maurizio Ferraris)的谈话中作出过解释——“‘精神传记’这一说法”也是极可质疑的，而在精神分析学诞生一个世纪之后，“有意识的精神生活”这一说法则更成问题。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界限在他看来极为脆弱模糊： 12

在某个公众人物——当人们根据某些含糊的标准而称之为公众人物时——的生命轨迹的一个特定时刻，其所有的私人档案，如果这一说法本身不算自相矛盾的话，只要不被立即烧毁，都注定要变成公共档案（即便被烧毁，它也会变成公共档案，除非它没有在身后留下一抹炽热的仍在述说的灰烬，供诠释者或公众分析出某些可供存档的症状）。^①

本传记因而不自设任何禁忌。描写雅克·德里达的一生，亦即叙述阿尔及尔那个12岁便被逐出学校的犹太孩子的故事，他后来成为全世界作品被翻译最多的法国哲学家；也是叙述一个脆弱而饱受折磨的人的故事，他直到最后始终自认为不受法国大学的青睐；亦即再现种种不同的世界，从独立前的阿尔及利亚到高等师范学校的小宇宙，从结构主义的纷繁变幻到1968年后的风云动荡；也是追述他与最重要的作家和哲学家们一系列不同寻常的友情，从路易·阿尔都塞到莫里斯·布朗肖，从

^① 雅克·德里达，1995年2月1日研讨课记录，当代出版资料馆档案。

让·热内到埃莱娜·西克苏 (Hélène Cixous), 还有埃玛纽埃尔·列维纳斯 (Emmanuel Levinas) 和让-吕克·南希 (Jean-Luc Nancy); 还是记述他同思想家们常常激烈而意味无穷的一系列论战, 无论是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Claude Lévi-Strauss)、米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雅克·拉康 (Jacques Lacan)、约翰·塞尔 (John R. Searle) 还是尤尔根·哈贝马斯 (Jürgen Habermas), 以及一些远远超越学术界的事件, 其中最著名的牵涉到海德格尔和保罗·德·曼; 更是再现许多勇敢的政治活动, 包括支持纳尔逊·曼德拉 (Nelson Mandela)、无身份者或同性婚姻; 也是叙述一个概念——解构 (la déconstruction) ——的命运及其异乎寻常的影响, 它远远超出了哲学界, 对文学研究、建筑、法律、神学、女性主义、酷儿研究和后殖民研究都影响深远。

13 为实现这一写作计划, 我当然尽可能全面地阅读或重读了他的著作。其卷帙浩繁人所共知: 80 部已出版的著作, 不计其数未曾集结成书的文章和访谈。我也尽可能参阅了许多二手文献。但我主要倚重德里达本人留下的数量可观的资料, 并会见了数以百计的当事人。

对于德里达这位《纸机器》(*Papier Machine*) 的作者, 档案令他着迷, 也是他不断思考的主题, 但同时也是非常具体的现实。正如他在最后的几次公开谈话中所说的: “我从未丢掉或毁弃任何东西, 哪怕是布尔迪厄或巴里巴尔 (Balibar) 放在我门口的小纸条……我保存着一切最重要的和似乎最无足轻重的东西。”^① 德里达希望这些资料均可供人参考, 他甚至说:

最美妙的幻想, 就是所有这些纸张、书籍、文章或软盘早已超越我的生命而存在。它们早已是见证。我不断地想到这些, 想着谁会在我死后前来, 看看譬如这本我在 1953 年读过的书并发出疑问: “他为什么在这儿做个记号, 又在那儿画个箭头?” 这每一张纸片、每一处踪迹的余存的质构萦绕着我。^②

这些我仔细研究过的个人资料主要收藏于两处: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朗森图书馆 (Langson Library) 的特别收藏处, 当代出版资料馆 (IMEC) 在位于法国戛纳附近的阿登修道院里的德里达遗赠。我渐渐熟悉了德里达那让所有了解他的

^① “Dialogue entre Jacques Derrida, Philippe Lacoue-Labarthe et Jean-Luc Nancy”, *Rue Descartes* n° 52, PUF, 2006, p. 96.

^② Jacques Derrida, “Entre le corps écrivant et l’écriture...”, entretien avec Daniel Ferrer, *Genesis* n° 17, décembre 2001.

人都觉得费解的字体，并有幸第一个看到了他终其一生积累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资料：学校作业，个人手记，书稿，未发表的教案和研讨会发言稿，访谈与圆桌会谈记录，报刊文章，当然还有信件。

德里达仔细保留着哪怕最微不足道的来信——他在临终前几个月还在惋惜唯一一封被毁掉的信件^①——但他极少打草稿或留备份。我必须进行大量搜寻工作才能找到或查阅到最重要的通信，比如他和路易·阿尔都塞、保罗·利科（Paul Ricoeur）、布朗肖、福柯、列维纳斯、加布里埃尔·布努尔（Gabriel Bounoure）、菲利普·索莱尔斯（Philippe Sollers）、保罗·德·曼、罗日·拉波尔特（Roger Laporte）、让-吕克·南希、菲利普·拉库-拉巴特（Philippe Lacoue-Labarthe）、萨拉·考夫曼（Sarah Kofman）的通信。更珍贵的还有他在成长期间寄给青年时代友人的一些信件，如米歇尔·莫诺里（Michel Monory）和毕仰高。还有许多已无处寻觅或丢失，比如他给亲友的大量信件。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特殊情况。我在德里达逝世后不久即开始撰写这部传记，用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的话来说，那时我们才刚刚看到“德里达的回归”。本书开始于2007年，出版于2010年，他该是80岁了。哲学家的大多数亲友这时都还健在，只依赖书面材料将是荒谬的。

玛格丽特·德里达（Marguerite Derrida）对我极为信任，她不但允许我接触所有资料，还接受我的大量访谈。同各个年代当事人的谈话也非常重要，这些会谈常常花很长时间，时有重复。我有幸访问了他的兄长、妹妹和他钟爱的表妹，以及他青年时代的许多同学和友人，得以了解被他称为“32年之久的青春期”。我采访了上百位人士：友人、同事、出版商、学生，甚至几个诋毁他的人。当然，我没能联系到所有可能的亲历人，还有一些人不愿见我。一部传记也是在种种障碍、抗拒或抵制中完成的。

面对自己投身的这一艰巨任务，我不止一次感到眩晕。完成这一计划大概需要某种天真或至少是憨厚的秉性。德里达著作最出色的诠释者之一杰弗雷·贝宁顿（Geoffrey Bennington）不是严肃地回避了撰写一部真正传记的可能性吗？

当然，人们期待有一天德里达成为传记的主题，而且什么都不能妨碍它以传统的体裁写成……但这种建立在迎合与补偿心理上的写作迟早会同德里达的

^① “我曾经毁掉过一封信。带着可怕的狂热：我想撕毁它——不行；想烧掉它——不行……我毁了一本不该毁掉的信件，为此悔恨终生。”（*Rue Descartes* n° 52, PUF, 2006, p. 96.）有迹象表明此事发生在1960年代末或1970年代初。

工作相冲突，因为后者很可能会动摇前者的假设。我们很可以断定，最后受到解构主义冲击的学术或近学术的写作体裁之一便是传记。……能否想象一种非等级化的、多重层分的亦即碎片的传记呢？它将摆脱主宰传统传记体裁的同一性和目的性。^①

我并不否认这一看法深具意义，但归根到底，我想要撰写的并非德里达式的传记，而是德里达的传记。在这件事上，就像在许多别的方面，我认为模仿并非我们能够致以他的最好礼敬。

我认为重要的是另外一种忠诚。从1974年第一次阅读《论文字学》（*De la grammatologie*）开始，雅克·德里达就一直隐秘地伴随着我。十年之后我开始结识他，那时他正在就我和玛丽-弗朗索瓦丝·普里萨（Marie-Françoise Plissart）合作的摄影集《注视的权利》（*Droit de regards*）撰写一篇不吝赞誉的评论。我们有过一些
16 信件和书籍的往来。我从不曾中断对他的阅读，到现在，有三年之久，他占据了我最好的时光，直至潜入我的梦中，仿佛一种不在场的合作。^②

写作一部传记便是经历一场亲密无间又时而令人胆怯的冒险。无论以后怎样，雅克·德里达都将成为我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就像一名已故的好友。他不会不拷问这奇特的单向的友谊。我确信无疑：传记只能书写死者。所有的传记因而都缺少那名至高无上的读者：死者。如果说存在着一种传记作家的伦理学，那也许就在于此：他是否敢手持此书站在他的传主面前？

① “A life in philosophy”，in Geoffrey Bennington, *Other Analyses: Reading Philosophy*, 电子版可见 <http://bennington.zsoft.co.uk>。

② 如希望了解更多有关本书的酝酿过程和作者所面对的问题，可参阅《与德里达在一起的三年——一个传记作家的手记》（*Trois ans avec Derrida. Les carnets d'un biographe*）。该书与《德里达传》同时由 Flammarion 出版。

目 录

I 杰基 (Jackie): 1930—1962

- | | | |
|-------|------------------------|----|
| 第 1 章 | 非洲国王(1930—1942) | 3 |
| 第 2 章 | 在阿尔及尔在阳光下(1942—1949) | 13 |
| 第 3 章 | 路易大帝高中的围墙(1949—1952) | 28 |
| | 第 4 章 高 师(1952—1956) | 48 |
| | 第 5 章 美国一年(1956—1957) | 67 |
| 第 6 章 | 克雷阿的士兵(1957—1959) | 77 |
| | 第 7 章 勒芒的忧郁(1959—1960) | 91 |
| | 第 8 章 走向独立(1960—1962) | 95 |

II 德里达 (Derrida): 1963—1983

- | | | |
|--------|------------------------|-----|
| 第 9 章 | 从胡塞尔到阿尔托(1963—1964) | 107 |
| 第 10 章 | 在阿尔都塞的荫庇下(1963—1966) | 123 |
| | 第 11 章 文字本身(1965—1966) | 133 |
| | 第 12 章 丰硕的一年(1967) | 148 |
| | 第 13 章 轻微的后退(1968) | 163 |
| 第 14 章 | 不适的位置(1969—1971) | 184 |
| | 第 15 章 决裂(1972—1973) | 205 |

第 16 章	《丧钟》(1973—1975)	229
第 17 章	捍卫哲学(1973—1976)	239
第 18 章	另一种人生(1976—1977)	258
第 19 章	从“新哲学家”到哲学大会(1977—1979)	268
第 20 章	发送与考验(1979—1981)	277
第 21 章	布拉格之夜(1981—1982)	298
第 22 章	新的牌局(1982—1983)	307

III 雅克·德里达 (Jacques Derrida): 1984—2004

第 23 章	解构的领地(1984—1986)	319
第 24 章	从海德格尔事件到德·曼事件(1987—1988)	341
第 25 章	生动的记忆(1988—1990)	363
第 26 章	六十岁哲学家的肖像	376
第 27 章	在体制的边界(1991—1992)	397
第 28 章	解构在美洲	407
第 29 章	马克思的幽灵(1993—1995)	417
第 30 章	德里达国际(1996—1999)	432
第 31 章	对话的时代(2000—2002)	448
第 32 章	向生向死(2003—2004)	470
	资料来源	492
	书目	495
	致谢	501
	人名索引	503
	译后记: 阅读德里达	536

I

杰基

Jackie

1930—1962

第 1 章 非洲国王^①

(1930—1942)

很长时间里，德里达的读者对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一无所知。他们仅仅知道他的出生年代——1930年，还有他的出生地——埃尔-比亚（El-Biar），即阿尔及尔的一个郊区。一些自传性的指涉文字确实出现在《丧钟》，特别是《明信片》里，但它们完全藏身于文本游戏，保持着彻底的不确定性，令人无从判断。 19

直到1983年，在《新观察家》（*Le Nouvel Observateur*）杂志刊登的与卡特琳娜·大卫（Catherine David）进行的访谈中，雅克·德里达才第一次同意提供一些事实上的细节。他含讥带刺，隐含愠怒，词锋简练，就好像急于摆脱这些让他无奈的问题。

您刚才谈到了阿尔及利亚，对您来说那是一切开始的地方……

呵，您希望我说类似这样的话：“我出生于阿尔及尔郊区埃尔-比亚一个已归化的犹太小资产阶级家庭，但是……”这有必要吗？我做不到，我需要帮助……

您的父亲尊姓大名？

好吧。他有五个名字，所有的家族名字和其他一些名字都隐藏在《明信片》里，他们本人有时都认不出来，这些名字常常不用大写，比如“埃梅”或者“勒内”……

您离开阿尔及利亚时多大年龄？

显然……我19岁来到法国。我从未远离埃尔-比亚。40年的阿尔及利亚战争，

① 原文内古斯（Le Négus），指埃塞俄比亚君主的称号。——译注